

# 在“怀疑一切”的时代，大学需重新证明“学习的意义”

■郭英剑

有一天，一位编辑朋友问我：“你那么拥抱人工智能(AI)，那你的文章是用AI写的吗？”

看到这个问题，我想起了自己一个20余年的写作习惯，即在每篇文章末尾都会记录文章写作的时间与地点。我想回复，看看我文章的写作时间与地点就知道答案了，但想了想还是回答道：“是我自己写的，不是AI写的。”

不作过多解释，是因为我深知解释再多，都像是在自证清白，反而给人一种越描越黑的感觉。当然，我也理解那位朋友的询问，因为就在前不久，我还看到一位语言学领域知名学者在朋友圈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大量我们认为真实的语言，其实都是大模型生成的。网络上近80%的文本都不是人写的。”

朋友的这个问题让我深思，因为它看似询问写作方式，实则指向了一个更深刻的变化——在AI时代，人们已经不再默认“表达背后一定是一个人”。

这绝不是一个小小的变化，而是一个结构性的转折。

## 语言的主体正在消失

回想并不遥远的过去，当你读到一篇文章时，会很自然地在脑海中构建一个“作者形象”。你可能不同意其观点，但会默认这个人的存在，并认为其对自己的表达负责。这种“表达-主体”的对应关系是现代信任的基础之一。

生成式AI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点。今天，一篇逻辑严密、语言流畅的文章能在几秒钟内生成。于是，一个关键问题出现了——当语言不再可靠地指向一个主体时，表达意味着什么？

在我看来，如果语言可以脱离主体独立存在，它就“表达”变成了“输出”。这不仅改变了写作，也改变了阅读。它把阅读的前提从“理解一个人”变成“判断一个来源”。如果只是文字，信任的动摇或许还局限在知识领域，而真正的断裂发生在多模态生成技术出现后。

过去，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维持基本的信任秩序，源于“伪造”本身具有较高成本，而这些“成本壁垒”构成了信任的隐性基础。

AI使这些成本迅速坍塌。更关键的是，这些AI生成内容不仅可以使使用，而且足够好。

这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语境，不是“有人在伪造”，而是“任何东西都可能被伪造”。当“可伪造性”成为普遍前提时，真实性就不再是默认状态，而必须被额外证明。由此，信任不再是起点，而成为一个昂贵的过程。

## 信任为何会崩塌

有人会把这种信任危机归结为“技术过硬”，但这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技术正抽空人类社会赖以建立信任的“中介机制”。

什么是中介机制？现代社会，我们并非通过直接接触所有人来建立信任，而是通过一系列“中介”，比如作者身份、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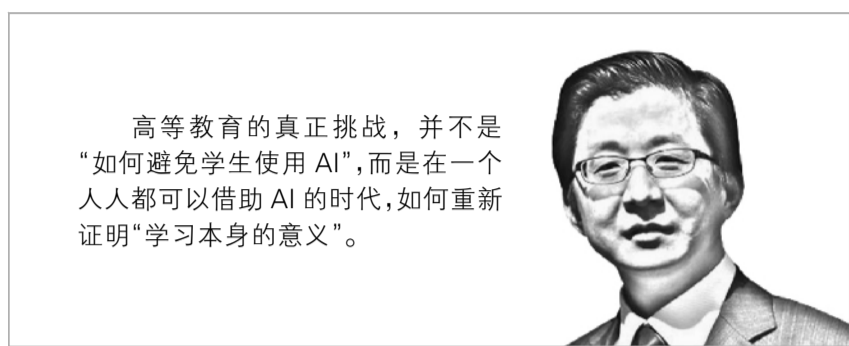


在人工智能(AI)的冲击下，大学正面临现实挑战，一方面迫切需要改革、主动拥抱，另一方面也不能乱了阵脚、盲目跟风。然而，这类常识在“实用”原则泛滥之时似乎站不住脚，许多大学正将迎合时代“风口”视为时尚。

近两年，高等院校大规模裁撤专业。这一现象与拥抱AI一样，都是“一窝蜂”式的，且都是以“创新”的姿态和“改革”的名义进行，不令人感到忧虑。

从现实来看，这类裁撤专业的举措主要是为了还专业大规模无序扩张的“债”，而过去高校这类专业扩张往往未考虑自身条件和社会需求。也就是说，它只是一次纠偏，而非创造新的学科布局。

大量增设专业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是伴随着大学合并潮而展开的，也是合并潮衍生的结果。由于合并后的大学大而全为追求目标，文、理、工、农、医一个都不能少，“巨型大学”的历史纪录也一次次被刷新。彼时的高中生源充足，加之随后的大学“扩招”政策实行，用



高等教育的真正挑战，并不是“如何避免学生使用AI”，而是在一个人人都可以借助AI的时代，如何重新证明“学习本身的意义”。

体机构、专业认证等。这些机制的作用是在陌生人之间建立可以延展的信任。

AI出现后，这些机制开始迅速失效——署名能伪造，内容可批量生成。当中介机制失效时，社会信任就失去了扩展能力，只能向内收缩。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种结构性的变化：信任不再是可以传播的，反倒变成必须亲自验证的东西。这恰恰是“信任崩塌”的真正含义。

在传统语境中，“怀疑一切”往往被视为一种极端立场，甚至是不健康的认知状态。但在AI时代，这种态度正变成一种理性选择。因为当环境本身不再提供可靠的信号时，信任就不再是美德，而可能成为一种风险。

当下，我们能清楚地观察到这个变化正在发生——人们对文章的第一反应不再是“内容如何”，而是“来源是否可信”；对视频的第一反应不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真实吗”；对声音的第一反应不再是“谁在说话”，而是“是不是合成的”。

这意味着人类的认知方式正从“理解世界”转向“验证世界”。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深刻的退化。因为理解需要信任作为前提，而验证则建立在怀疑之上。当整个社会从“理解导向”转向“验证导向”时，人类的交流成本将急剧上升，认知效率将显著下降。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变得异常脆弱。

## 从“轻信任”走向“重信任”时代

在此背景下，我们看到一个看似矛盾、实则必然的趋势——技术越发达，人们越渴望面对面交流、对话乃至交锋。

这是因为在所有可被伪造的媒介中，“在场”仍是最难被完全替代的经验。这也恰恰意味着信任不再是“低成本的社会基础设施”，而重新变成了一种“高成本的人际资源”。

在我看来，这将深刻影响教育、商业、政治乃至日常生活。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AI不会退出历史，“可伪造性”也不会消失，一个可以轻易生成一切的时代已经到来。因此，问题不在于如何回到过去，而在于如何在没有一个无法回避怀疑的时代重新建立信任。

换言之，未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再是自然生成的，也不再依赖单一来源，而是逐渐建立在三个相互支撑的层面之上。

其一，它是可追溯的技术与制度机制。当真实不再自证，它就必须被标记、

记录和验证。无论是文本、声音还是影像，来源认证、生成记录、数字水印以及平台责任将成为新的基础设施。

其二，它是可识别的主体与责任承担。人类表达的价值不再只是“能否表达”，而在于“是否承担表达”。未来的信任将愈加依赖主体的稳定性与可识别性，而非单次内容的优劣。

其三，它是不可替代的真实在场经验。“在场”重新成为信任基础，面对面的交流、未加工的互动、不可剪辑的真实情境将成为人们重新建立信任的重要方式。

这三点也同时意味着人类社会正在从一个“轻信任时代”走向一个更为复杂的“重信任时代”。

## 高等教育将走向何处

如果说，AI正在重塑社会的信任结构，那么高等教育无疑是最早也最深刻受到冲击的领域之一。因为大学从来都不只是知识生产的场所，更是信任生产的制度空间。

传统意义上，大学之所以能成立，依赖于几种基本信任——教师的讲授是真实的、学生的作业是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是基于严肃探索的、学术共同体内部遵循基本的诚信原则。换言之，大学运行的前提并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大体可信。

如今，当学生能借助AI完成作业、论文乃至考试时，“学习”与“生成”之间的边界开始模糊；当文本可以被高质量生成时，“表达能力”不再等同于“理解能力”；当AI可以模拟学术写作时，“研究成果”也面临新的真实性挑战。这意味着传统的评价体系在失去原有的判断力。

于是，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浮现出来：如果我们无法确认学生是否真正理解，大学在评估什么？

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教育理念问题。如果大学继续沿用以“结果文本”为中心的评价方式，AI将不可避免地侵蚀其有效性；而如果一味加强技术监控，则又可能走向另一极端——用不信任来维持信任。

这正是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深层困境。

因此，真正的出路或许不在于简单地“防范AI”，而在于重构教育的核心逻辑。

首先，需要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导向”。比起一篇最终完成的论文，更重要的是学生如何提出问题、展开思

## 中国大学评论

# 裁撤专业应基于大学理念而非迎合时代“风口”

■尤小立

“大”，而是“小”，因为原来的系科变成学院后，常常出现各自为政的情况，相互交流反而变少了。学科交叉、融合的理想受管理机制所限，并未打破“条块分割”的局面，结果是连实验室和实验设备也要“亲兄弟明算账”。校园中，综合性、交叉融合性的附属科研机构自然不少，但大多只是未配备专职研究人员的“虚体”，甚至名称“高大上”的机构也往往是因人设岗，一旦“带头人”另谋高就，机构就可能不再存在，即便保留，也会失去活力。

由此可见，当大学的办学模式转变后，若没有按照这个模式所依据的理念发展下去，不仅这个转变本身的价值无法体现，而且会让大学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大量裁撤专业就是这种被动地位下的被动行为。一方面，由于大量“时髦”的新专业是以“就业”的名义吸引生源，当专业就业前景堪忧时，这类专业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出于实用目的设置专业，本身就侧重应用，没有实操经验的教师讲实操课程，只能说是“扬短避长”。

从某种程度上看，如今的大学又

考，并在讨论中修正自身观点。只有将学习嵌入可见的过程中，评价才不至于完全依赖“最终文本”。

其次，需要重新强调“在场性”的教育价值。课堂讨论、现场表达、即时回应，这些曾被视为效率较低的教学方式，在AI时代反而成为最难被替代的部分。教育不只是传递知识，更是一个人在场、思考、回应他人的过程。

最后，需要重新界定“能力”的含义。如果AI可以帮助完成表达，那么教育的重点就不应停留在“写得更好”，而应转向“想得更多”。提出问题、判断信息、整合复杂观点的能力将比单纯的表达能力更加重要。

因此，高等教育的真正挑战，并不是“如何避免学生使用AI”，而是在一个人都可以借助AI的时代，如何重新证明“学习本身的意义”。

这将带来一场深刻的转型，它要求大学从“知识传授中心”转向“理解能力的培养场”；从“结果评价体系”转向“过程参与结构”；从“默认信任”走向“有意识地重建信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等教育或许不只是被动承受这场信任危机的冲击者，更应成为重建信任的先行者。

## 重新理解“信任”本身

当然，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还不只是机制如何重建，高校如何应对的问题，还有在这一时代，人类将如何重新理解“信任”本身。

过去，我们习惯于把信任当作一种背景，时刻存在却不被察觉。而今天，信任正在变得稀缺，于是它第一次从“隐形结构”变成“显性问题”。这迫使我们重新面对一个更为根本的命题——信任是否可能建立在“确定性”之上？当确定性不再可靠，人类是否仍然能够彼此连接？

答案或许并不在于消除不确定，而在于学会如何在不确定中建立有限信任。这或许是一种更成熟也更艰难的信任形态，即在意识到一切都可能被伪造之后，仍然选择为真实承担责任。

因此，AI时代真正的挑战并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人的问题。当机器可以生成内容，人类必须重新定义自身位置；当表达不再稀缺，人类对表达承担的责任反而成为稀缺之物。也许，未来最值得信任的不再是“最完美的表达”，而是“最稳定的存在”；不再是“最流畅的语言”，而是“最愿意被验证的人”。

在我看来，AI不会终结信任，但它正在终结一种轻而易举的信任。它迫使人类走向另一种更缓慢、更昂贵，也更真实的关系形态——信任不再来自媒介的保证，也不再来自技术的表象，而是来自一个人长期、一致、可被辨认的存在。

这也提醒我们，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从来不只是传授知识，更在于培育一种可以被信任的理解力，一种能够经得起追问、能够回应他人，也能够对自身表达负责的能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

## 呼吁：AI教育治理不能各自为政

随着AI在教育领域的快速渗透，如何构建协调一致的政策框架与治理机制也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此次AERA年会专门设立了多个专题论坛，探讨AI教育政策的跨国比较、地方实施与治理治理，展现了从“技术驱动”向“制度协同”转型的全球共识。

当前，美国AI教育政策呈现出“地方先行、逐级扩散”的特征。美国波士顿学院研究团队对全美各州K-12的AI政策文件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该国多数州仍停留在原则性指导层面，缺乏具体实施路径与资源配置。同时，部分州已开始制定包含教师AI素养标准、学生数据隐私保护与算法公平性审计在内的综合性政策框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历克斯·鲍尔斯在分析州级教育数据系统时指出，政策制定者需要在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寻找平衡点，过度监管可能抑制AI教育应用的多样性，而监管真空则可能导致伦理失范。

在国际层面，哈佛大学教授费尔南多·雷默斯系统比较了全球南方国家在AI教育政策上的差异。他指出，资源匮乏地区往往更关注AI的可行性与基础设施建设，而发达国家则更聚焦于伦理规范与质量保障。

讨论中，多国学者呼吁制定跨国通用的AI教育标准或框架。

维克多·李直言，数据隐私、算法偏见与数字鸿沟是当前AI教育最紧迫的三个伦理维度。他呼吁建立可解释的AI标准，确保教育决策的透明性与可问责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托马斯·菲利普也表示，AI系统的设计往往隐含开发者的价值预设，若缺乏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技术可能无意中强化既有的教育不平等。

在笔者看来，此次AERA年会传递出的共识可归纳为一点，即AI教育治理不能各自为政，须加强跨国协同。例如，建立国际性的AI教育政策观察站，定期发布各国政策进展报告等，并推动伦理准则的互认与对接。只有通过持续的国际对话与协同行

4月上旬，全球教育研究领域规模最大的学术盛会——美国教育研究学会(AERA)年会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本届年会汇聚了全球上万名教育学者与实践者，堪称教育研究的“超级论坛”，笔者也有幸参与了此次盛会。

作为此次年会的重要内容，来自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等全球顶尖学府的核心研究团队，围绕人工智能(AI)如何重塑教与学的未来展开多场密集对话。从深度学习算法到课堂人机协同，从算法公平到教师角色转型，这场盛会清晰揭示了AI驱动全球教育变革的动力与发展趋势。

## 突破：AI赋能个性化学习的无限可能

当下，AI已经影响并渗透到教育的各个领域，也衍生出了很多重要议题，其中就包括AI对个性化学习的影响与驱动。在本次AERA年会上，它也成了最受瞩目的议题之一。从智能辅导系统到自适应学习平台，从认知诊断模型到情感计算，学者们在展示AI重塑个性化学习路径前沿探索的同时，也揭示了技术赋能教育的无限可能。

在报告中，斯坦福大学副教授维克多·李直言，目前的AI系统已从简单的问答工具演进为能够理解学生认知状态的智能导师。他表示，通过大语言模型与学习分析的深度融合，AI能够实时识别学生的知识盲点与认知缺陷，进而提供精准的个性化指导。

作为该论坛的一个例证，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埃里卡·帕塔尔团队的研究表明，基于智能体的在线干预系统能显著提升学生在生物医学课程中的学习自主性。该系统通过动态调整问题难度与内容呈现方式，使每位学生都能在“最近发展区”内高效学习。

在个性化学习路径的规划方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扎卡里·帕尔多斯展示了基于知识图谱的个性化推荐系统。该系统能将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与学科知识结构进行映射，并自动规划最优学习序列。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研究团队则利用多模态数据分析，例如眼动追踪、面部表情识别与交互行为日志，构建了能够预测学生认知负荷与情感状态的AI模型，从而实时调整学习材料的呈现方式与节奏。

此外，AI在形成性评估与反馈领域的应用方面同样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克里斯汀·格林豪指出，生成式AI能够针对学生的开放性回答提供即时、具体且具有建设性的反馈，这在传统教学模式下难以大规模实现。

“更重要的是，AI系统能通过分析学生的错误模式，识别其深层概念误解，而非仅仅停留在答案正误判断层面。”格林豪说，这种“诊断式反馈”使个性化学习不再局限于内容推送的差异化，更延伸至认知策略的针对性培养。

## 呼吁：AI教育治理不能各自为政

随着AI在教育领域的快速渗透，如何构建协调一致的政策框架与治理机制也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此次AERA年会专门设立了多个专题论坛，探讨AI教育政策的跨国比较、地方实施与治理治理，展现了从“技术驱动”向“制度协同”转型的全球共识。

当前，美国AI教育政策呈现出“地方先行、逐级扩散”的特征。美国波士顿学院研究团队对全美各州K-12的AI政策文件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该国多数州仍停留在原则性指导层面，缺乏具体实施路径与资源配置。同时，部分州已开始制定包含教师AI素养标准、学生数据隐私保护与算法公平性审计在内的综合性政策框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历克斯·鲍尔斯在分析州级教育数据系统时指出，政策制定者需要在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寻找平衡点，过度监管可能抑制AI教育应用的多样性，而监管真空则可能导致伦理失范。

在国际层面，哈佛大学教授费尔南多·雷默斯系统比较了全球南方国家在AI教育政策上的差异。他指出，资源匮乏地区往往更关注AI的可行性与基础设施建设，而发达国家则更聚焦于伦理规范与质量保障。

讨论中，多国学者呼吁制定跨国通用的AI教育标准或框架。

维克多·李直言，数据隐私、算法偏见与数字鸿沟是当前AI教育最紧迫的三个伦理维度。他呼吁建立可解释的AI标准，确保教育决策的透明性与可问责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托马斯·菲利普也表示，AI系统的设计往往隐含开发者的价值预设，若缺乏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技术可能无意中强化既有的教育不平等。

在笔者看来，此次AERA年会传递出的共识可归纳为一点，即AI教育治理不能各自为政，须加强跨国协同。例如，建立国际性的AI教育政策观察站，定期发布各国政策进展报告等，并推动伦理准则的互认与对接。只有通过持续的国际对话与协同行

# 『个性化』的教育需要『全球协同』

■赵硕 韩毅

动，才能确保AI真正服务于全球学习者的共同福祉。

## 启示：让学习者与AI共存共进

当AI深刻重塑全球教育生态，我国作为教育大国面临着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的关键任务。2026年AERA年会呈现的全球趋势与研究成果，可为我国培养面向AI时代的终身学习者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

首先，要培养终身学习者，要让学习者具备与AI共存、共进的基础素养。

根据维克多·李的论述，AI素养应包含技术操作、算法理解、数据隐私与伦理批判四个层次。在这方面，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已经初步纳入AI模块，但在实施深度与覆盖面上仍有不足。对此，一方面要推动AI素养与中小学不同学科的融合；另一方面也要鼓励高校开放AI通识课程，面向全社会提供微证书与在线学习资源，真正打通从基础教育到终身学习的通道。

其次，教师的AI胜任力是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重要支撑。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师队伍，应依托“国培计划”与各地教研院体系，系统开展AI教学应用工作坊，重点培养教师的三方面能力，即利用AI进行学情分析与个性化辅导的能力、甄别AI生成内容真伪与偏见的批判性素养，以及设计“人机协同”学习任务的教学设计能力。

再次，AI教育治理需要协同推进，避免“技术先行、制度滞后”。在这方面，我国已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多个文件，但在地方落实层面仍需细化。下一步应建立省级AI教育资源统筹机制，防止“各自为政”导致的重复建设，同时需要加快制定关于学生数据隐私保护与算法公平性审计的地方标准。

最后，培养终身学习者不能只关注城市重点学校，更须聚焦农村与边远地区。AERA年会多项研究指出，AI资源的获取不均已成为新的教育不平等因素。我国可通过“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向全社会免费提供优质AI课程与工具，同时应发挥“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等项目的辐射作用，组织城市优秀教师为乡村学校提供远程AI教学指导。

此外，还应鼓励高校、科技馆、公共图书馆面向社区开展AI科普活动，营造“人人可学、处处能学”的终身学习氛围。

总之，培养面向AI时代的终身学习者是一项系统工程。唯有课程、教师、政策与教育公平协同驱动，我国才能在全球AI教育变革中走出一条既有中国特色又具国际视野的发展道路，让每一个学习者都能在智能时代持续成长。

(作者分别为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化学院教授、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研究实习生；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欧洲大学ICT数字化教育发展新研究”(23YJA88008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04阶段教育比较研究”(CUC25CJGJ04)阶段研究成果)